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社会学（第四辑）

Vital stat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demography

生命统计学概论（一）

〔美〕辉伯尔 (G.C. Whipple) 著

张世文 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社会学（第四辑）

Vital stat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demography

生命统计学概论（一）

〔美〕辉伯尔（G.C. Whipple）著 张世文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统计学概论/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社会学)

ISBN 978-7-5520-1846-2

I. ①生… II. ①李… III. ①人口统计学 IV. ①C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233号

生命统计学概论 (1-2册)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62.5

字 数: 82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46-2/C.137 定价: 290.00元 (1-2册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三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美] 輝伯爾 (G.C. Whipple) 著 張世文 譯

生命統計學概論 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夫人陳桂元女士藝術家善書畫貴州貴陽人生於前清宣統二年八月十四日不幸因傳染猩紅熱症於民國廿四年六月六日下午六時病故於河北省定縣平教會之保健院得年廿六歲正值本書付梓本書在翻譯時多承

夫人熱誠幫助始克早日完成本書之譯在喚起國人對於公共衛生預防醫藥與生命統計之注意與研究故特將此書獻給我已故的

夫人以做永遠之紀念

張世文謹誌

民國廿四年六月六日夜於定縣

方序

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人民之數，小司徒以下，至於鄉師、鄉大夫、閭胥，遂人諸職，則稽夫家人口之數，而辨其貴賤老幼廢疾焉。人口死生之數，於是乎詳，凡百政令，於是乎出；故成周之治，至今稱盛。自漢以後，按丁以徵賦役，蕭何入關中，首收秦戶籍，漢以滅楚，景帝之世，男子二十始傅，天下以寧；版籍之重蓋如此。有清制，賦不以丁而以畝，於是黃冊廢，而人民無老無幼，無貴無賤，終身不著於版籍。人口之消長，不可知，民命之壽夭，更無可紀。曰四萬萬，則永爲四萬萬而已矣；曰某國平均之生命長，吾國平均之生命短，則短之而已矣。既無版籍，何有統計，既無統計，何以定一切之設施；此政之所以不綱，國之所以日蹙也。吾今且言最近之一例：衛生行政者，所以保人民之健康，而延永全國之總壽命者也；然必知全國壽命之奚若，而後施針砭爲有濟。生命統計者，全國壽命之總帳也；全國人口之總數若干，每歲生者若干，死者若干，夭者若干，壽者若干，某年齡之死者若干，死於某疾病者若干，死於

其原因者若干，男女之生死，其比例如何，無不一一而列計焉，覘其盈虛消息，而謀所以禦防之道。及來歲而又列焉，視其數之升降，而知其政之良否，於是而衛生之行政，而衛生之效亦著。今也不然，無冊籍，無統計，一議興，則茫然從之，政成而莫能言其效，無怪乎衛生行政不能見信於人人，而昌之數年，終無由推行而盡善。然此非一朝一夕之手足之力也，上之須有提綱挈領之人，月要歲會，以程其功。下之須有多數之專家，抉微著顯，以佐其事。戶口之統計詳，而後生命之統計有據，生命之統計有據，而後庶政乃可因以爲設施，衛生行政其一也。夫以今日吾國人才之缺乏如此，而統計之學，其繁重又如彼，其事豈易言哉。雖然，泰山之溜穿石，單極之繩斷絙，亦視乎吾人用力如何耳！有口焉，能言其要，有筆焉，能述其詳，亦足以樹一時之風聲，爲學子之先導；鐘鳴谷應，風起草偃，未必無收功之一日。張世文先生，世之有心人也，鑒於統計學之重要，而生命統計，尤與衛生行政有密切之關係。治事餘晷，因取輝氏生命統計學而逐譯之，出版有日矣。作始也簡，將畢必鉅，生命統計之學，於此而芽蘖焉，茁長焉，以至蔚爲楨幹，樹爲棟梁，上復成周之功，旁追歐美之盛，皆於是乎在。張君乞予序，遂書是語而歸之。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日

方石珊

陳序

近年來國內保護人民健康之工作，日有進步。各衛生機關爲測量社會健康情形起見，收集生命統計材料，不遺餘力。各醫學專校在教授公共衛生課程方面，引用生命統計理論，亦逐漸增多。惜乎生命統計書中，苦無中文譯本，一般初學者往往感覺探求之困難。今友人張君世文，於實行社會調查工餘之暇，將新大陸上最通行之 *G. C. Whipple, Vital Statistics* 全部譯就。從此各衛生機關與各醫校學員可減少許多不便之處。其於提倡生命統計學術之研究與應用，固有莫大之貢獻。茲願爲國人介紹之。

陳志潛

廿三年十二月於定縣

袁序

生命統計學爲人口問題研究及公共衛生進步之基礎。由此不但可得人口變遷及生死疾病等之精確情況；且可規定人口問題研究之程序及公共衛生實施之方針。

近年關於人口問題及公共衛生極引國人注意。生命統計學之重要，不容忽視。然國內此項專門書籍，尙付闕如。從事統計工作者，如不諳西文，不免有向隅之嘆。張君世文在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擔任人事統計調查有年，經驗宏富。今將 *G. C. Whipple, Vital Statistics* 一書，譯成中文，便利讀者，誠非淺鮮。

原書甚切實用，在美國頗通行。專攻生命統計學者，咸認此書爲佳作。張君譯稿既成，行將付梓，問序於余。因綴數言，以資介紹。

袁貽瑾

譯者序

近年來政府與社會人士都很注意社會研究與社會統計；實際從事此種工作者日漸增多，因此關於社會調查與社會研究出版的書籍與雜誌，亦風起雲湧；這實在是吾國社會科學之一大進步。但社會研究與社會統計中之最基礎、最重要的工作，似少有人研究注意。此種基本工作為何，即生命統計學之研究是也。生命統計學為統計學中最重要之一部分，為應用於社會與國家的生命歷史上的一種數量的科學。廣汎說來，生命統計學包括人類全部的研究；即人類受遺傳與環境的種種影響，亦無不都包括在它的研究範圍之內。此種研究之結果，可用數目字表示出來，如決定死亡之種種情況，婚姻、出生、死亡、疾病、犯罪、災害、貧窮等。總之生命統計學有生物學與社會學的兩方面，這兩方面對於社會的進步與民族的發展，均有極大價值。

生命統計學與普通統計學一樣，均有兩種目的，一為科學的目的，一為應用的目的。科學的目

的爲確定分析事實，預備尋求因果。應用的目的爲求知惡情況的發生及其來源，用以作改良的根據。雖然我們現在所說的生命統計的科學是一個比較近代的東西；但是生命統計並不是新東西，它的淵源極早。以前埃及、希臘、羅馬都曾有過戶口調查。羅馬還有過出生與死亡的註冊。至於近代生命統計的先鋒，要道推英國的葛蘭德（Captain John Graunt）與貝特（Sir William Petty）。他們不但研究出生率，死亡率，嬰兒死亡與疾病等統計；並且研究氣候對於死亡率的影响。英國倫敦第一次的死亡報告書是在英王亨利第八那時編製的，一直繼續到一六〇三年，每週出版一次，爲的是報告瘟疫死亡的人數。瘟疫給與生命統計一種極大的激勵，幫助了生命統計的發展。一八三一年英國因有虎烈拉之侵入，始創辦了全國死亡註冊。一七四一年許斯密（John Peter Süssmilch）曾出版了一本關於生命統計很重要的著作，從他的著作中，他抽出道德的推論，並且用統計說明自然律。

後來各國才漸漸產生蒐集全國生命統計材料的方法與制度，生命統計學也因此發達起來。現在世界上各文明國家沒有不拿生命統計當做一件政府極重要的事去幹。國家不但可以根據